

紅魔劫

陳布雷與女兒陳璉

● 劉民達

無暇參與政治活動

陳璉於一九四二年秋季開學時轉入中大歷史系二年級。中央大學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建立有中共的黨總支，屬重慶市地下黨組織直接領導，而在皖南事變後，根據中共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中大的中共黨總支停止活動，校內大部分黨員撤離重慶。正在這個時候，陳璉轉學到了中大，黨組織關係不能轉到中大，仍是直接和重慶的中共南方局錢瑛同志聯繫。

陳璉此時雖是歷史系二年級，但要補修歷史系一年級的必修課《中國通史》和《西洋通史》（即今天的世界通史）以及哲學系的《哲學概論》，還要讀二年級的必修課《中國近代史》、《歐洲近代史》（即今天的世界近代史）。這都是三個學分或四個學分的課；三五一十五，已經有十六七個學分了。學校規定，二年級學生選課不能超過十八個學分。陳璉又選了賀昌群的《隋唐五代史》，同系主任張貴永要求多加三個學分的沈剛伯

的《希臘羅馬史》。這在中大當時都是很叫座的課。這樣，陳璉作為特殊情況，在二年級就讀了二十一個學分。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和張貴永的《歐洲近代史》是兩門硬碰硬的課，指定的參考書非常多；張貴永的《歐洲近代史》是一大堆英文參考書。在一

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這一學年，陳璉基本上沒參加政治活動，全力投入到功課上，一年下來，也都考試及格，不過成績也都只在中等，但因為曾作過《論魏徵》的論文，又讀過新舊唐書，對隋唐史很感興趣，所以對賀昌群的《隋唐五代史》成績卻很突出。雖然課程這樣繁重，陳璉還和同寢室的化學系肖慶谷和師範學院史地系陸漱芬等人組織讀書會，閱讀和討論毛澤東的新著《新民主主義論》。肖慶谷和陸漱芬二位在一九七九年還對筆者說：

「陳璉和我們住在一個屋裡有一兩年，我們那時誰也不知道她是陳布雷的女兒。我們就知道她思想進步，常常不聲不響的把《

任中大歷史系助教

一九四三年春，中央大學雖沒有中共的黨支部，但有四十多名進步學生自行結合傳借進步書報和研究時局與抗戰前途。大家要求建立組織，經過《新華日報》，與中共南方局取得聯繫。南方局青年組同意在中央大學建立「據點」（當時均沿用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使用的名稱）。陳璉因為和南方的錢瑛直接聯繫，所以一直不和「據點」的同學發生接觸。

陳璉拼了一年用力讀完二年級所選各課，一九四三年秋季開學，升入歷史系三年級，就著重選賀昌群所開的課程《魏晉南北朝史》、《世說新語》等課，有時也到賀昌群家中去請教。賀昌群知道陳璉是陳布雷的女兒，但對她像普通平民子女一樣的爲人和生活，感到頗爲詫異，覺得在學術上很有希望，就有意引導陳璉去研究隋唐史。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度裡，在賀昌群指導下，陳璉著重讀了關於隋唐史的書，已可以看出

中學術上路子是研究隋唐史。一九四四—一九四五五年，陳璉已升入歷史系四年級，並在一九四五年暑假畢業。一九四五年初，中共南方局批准在中大建立新民主主義青年社，陳璉也沒有和新青社有聯繫，所以中央大學的地下黨員中從來沒把陳璉算入。這是在今天應當補正的。

一九四四年冬，國民黨發動青年從軍運動時，中央大學的學生確有些像一窩蜂一樣報名參軍，而陳璉卻寓意深刻的對同學們說：「看問題要由表及裡，遇事當頭腦冷靜要三思而行才不致後悔。」陳璉說這些話顯然是給從軍運動潑冷水，她自己又沒有去報名參軍。這樣一來，就引起歷史系的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對陳璉的不滿，說：「陳璉是陳布雷的女兒，居然不報名參軍！」面對這些人的挑戰，陳璉也不示弱，說：「人各有志，陳布雷的女兒也是一樣。」這些同學看陳璉毫不示弱的態度，也不敢再說什麼。

正在這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根據中英庚款文化交流規定，英國請張貴永到牛津大學講學；中央大學歷史系主任一職就空了下來。正好吳有訓由聯大理學院長來接中大校長，經歷史系教授協商，推出賀昌群任系主任。吳有訓接受了歷史系教授的意見，賀昌群遂出任歷史系主任。賀昌群根據歷史系發展需要，又是戰爭已經結束的時候，就申請在歷史系留兩個畢業生為助教，其中一人可由研

究生兼任。當年秋季開學時，賀昌群就留了潘天楨（五十年代中期任南京圖書館館長）為專職助教，錄取陳璉為歷史系研究生兼任教。

民主力量的大檢閱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擺在每個人的面前，特別對政治敏感性較強的大學生來說，更是為中國的兩種前途和兩種命運而擔憂。圍繞著國共兩黨談判結果的《雙十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陳璉對哲學系的老同學劉秀麟以及同寢室的同學（也是國立二中的老同學）都一一對國內的政治形勢作出分析，指出：「國民黨內的死硬頑固派是堅持要打內戰。中國在對日打了八年的『國仗』之後，現在又有了內戰的危險。國民黨打了十年的內戰都沒有消滅共產黨。共產黨在艱難困苦之中，和日本人苦鬥了八年之久，現在國民黨想消滅共產黨，肯定這是辦不到的，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的。」

中國現在正處在十字路口，只要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反對內戰，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內戰才有可能被制止；不然，內戰的前途是很難避免的。」陳璉的分析使大家認清了形勢。

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五日（政治協商會議定於卅一日閉幕），在政協開會期間，民主同盟為促進政治協商會議達成任務，聯合中大的新民主主義青年社（新青社的骨幹成員都是中共地下黨員），發動重慶的中央大學、復旦大學和重慶大學作擁護政治協商會議的大遊行。復旦大學遠在北碚，參加遊行的師生廿四日晚住在沙坪壩中大學生宿舍。廿五日早上六時，遊行隊伍由中大出發，中大校長吳有訓走在隊伍的最前方。陳璉因為和中大的黨組織沒有聯繫，上級組織指示她不能用任何的進步姿態暴露身分，所以她就以「我是研究生兼助教，不適合參加學生的行列」為理由沒有參加遊行（實際上中大的中地下黨員和新民主主義青年社員都參加了遊行隊伍，地理系主任李旭旦教授、歷史系主任賀昌群教授和蔣孟引教授兩人都參加了歷史系的遊行隊伍）。遊行隊伍的口號是「政治民主化」、「經濟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等。遊行隊伍到上清寺國民政府內，孫科代表國民黨、周恩來代表共產黨、莫德惠代表社會賢達（即無黨派民主人士），張君勸代表民主同盟，都對遊行隊伍發表簡短講話。遊行隊伍到通遠門水巷子英國大使館門前，抗議英國在九龍新界越界修築白爾丁機場。這次遊行，是民主力量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支持，實際上也是對中共提出的組成聯合政府的支持，也是重慶的民主力量大檢閱。

全力參與共黨革命

中共和民主力量要求和平、民主，實現

(三) 陳璉與雷布陳

而國民黨內的死硬頑固分子卻一意孤行，堅持一黨專政。二月十日，重慶各界在校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時，國民黨製造了「二·十」慘案，破壞了大會的召開。接著，二月中旬東北發生了「張莘夫事件」，在重慶南渝中學（即南開中學）讀書的張莘夫女兒在重慶各大學進行煽動，終於二月廿二日國民黨發動了在其統治時期規模最大的「二·廿二」反蘇大遊行，遠自合川、江津、白沙、永川的學生都自帶乾糧到重慶遊行，人數達五、六萬之多，前後歷時一周。應當說，學生們在抗戰甫告勝利之時，激於愛國的熱忱，對蘇軍在東北的撤走日本人統治時期設置的機器，在情理上是中國人絕不應接受的。但國民黨不此之圖，卻醉翁之意不在酒，名為反蘇，目的在打擊要求和平民主的中共。當中大松林坡的高音喇叭催促大家去參加遊行時，面對國民黨、三青團分子叫囂「不參加遊行的學生，開除學籍」；陳璉很冷靜的對親近的同學說：「這種遊行不能去參加。」

中大為了準備遷返南京，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五日學期結束；五月初，第一批復員師生乘輪東下。陳璉到系主任賀昌群那裡說明，她要和家中一齊復員回南京，不能隨學校復員。陳璉自經過「二·廿二」反蘇遊行後產生了一個錯覺，錯誤的認為「中央大學是反動的大本營」，加上陳璉的組織關係在復員時，又由南方局轉給袁永熙帶到了北平，

所以一心一意想離開中大。在和賀昌群談話時，陳璉就露出這個思想，表示準備辭掉中大歷史系的助教，研究生也不作了。賀昌群一再對她挽留，並表示在陳璉研究生畢業升爲講師時，《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可以交陳璉開課。但陳璉一心想的是革命，絲毫不考慮個人的學術前途，謝絕了賀昌群的好意；當年五月初，就隨全家由重慶復員到南京，很快又遷居上海。

陳璉復員到南京後，決心離中央大學，托六叔陳訓愈在上海《申報》館資料室找到工作，也工作了一段時間。一九四六年秋，陳璉由上海到北平，在貝滿女中任歷史教員，在該校組織讀書會，發展民主青年聯盟盟員，並擔任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業青年文部委員，由屬於南方局系統的北平地下黨委員會負責人袁永熙領導。一九四七年八月底，陳璉與袁永熙在北平六國飯店結婚。

陳璉夫婦被捕入獄

陳璉與袁永熙結婚剛過一個月，在臨近中秋節的九月廿四日晚上，他們居住在棉花胡同的家裡剛開過支委會後，兩人卻被捕了。後來，中共在北平一個地下電台被破獲，報務員李政宣被捕叛變。特務從田沖家中搜出了袁永熙的名片，特務審問田沖，田沖供

出來貝滿女中有個名叫田沖的教員，一天到陳璉家中去訪問，同袁永熙交換了名片。後來，中共在北平一個地下電台被破獲，蔣介石，請蔣氏決定處置。蔣介石一看此案是陳布雷的女兒和女婿，心中感到萬分矛盾，要是採取斷然手段處置此案，對陳布雷的打擊一定很大；當時陳布雷已經失眠症很重失眠的問題了。蔣介石在傅作義的來信上加了附言寫道：「此事請布雷先生據實酌情提出處理意見。」陳布雷看了傅作義的來信及

出了名片上的袁永熙是他的領導，又胡說一些不真實的情況，於是就牽連到陳璉和袁永熙，兩人遂於當晚十時左右被捕。同時在陳璉家中被捕的，還有邢方群（邢福津）和陳彭遠，兩個特務押著袁永熙、陳璉乘上一部汽車，兩個特務押著邢方群和陳彭遠乘另一部汽車，送往北平炮局監獄。在獄中，特務對陳璉說：「你丈夫已招認了，你快些坦白，可以從寬處理」；又對袁永熙說：「你太太已經交代了，你快老實交代，不然，前途危險」。他們兩人對於特務的審訊根本不予置理。特務對袁永熙施行酷刑，還要拉陳璉到審訊室門口去規勸袁永熙，陳璉堅定的回答特務們說：「袁永熙根本沒有任何事情，我勸他什麼！」

特務們已經知道陳璉和袁永熙是陳布雷的女兒和女婿，現在又遇到他們夫婦二人都堅決不承認是共產黨，感到萬分棘手，就一直拖到十二月。傅作義出任華北「剿匪」總司令後，特務們就將此案上報到總司令部，傅作義也感到很棘手，就以個人名義寫信給蔣介石，請蔣氏決定處置。蔣介石一看此案是陳布雷的女兒和女婿，心中感到萬分矛盾，要是採取斷然手段處置此案，對陳布雷的打擊一定很大；當時陳布雷已經失眠症很重失眠的問題了。蔣介石在傅作義的來信上加了附言寫道：「此事請布雷先生據實酌情提出處理意見。」陳布雷看了傅作義的來信及

蔣介石加的附言，立即毫不遲疑的寫了四個字「化家爲國」的短信給蔣介石，裝在蔣的來信中一齊送給蔣介石。蔣介石看了陳布雷八九，但尚不明白這四個字出典何在，就問手下的秘書這四個字出自何典，秘書詳細告訴他這是李世民起兵反隋的故事，蔣介石一聽，知道陳布雷的意見按處置共產黨的辦法處理；回到辦公室內又反復看了陳布雷的四個字的覆信，細細一想，覺得不能照這辦法處理；如果那樣一來，殺了陳璉夫婦二人，陳布雷也將會由此而嚴重的失眠，由嚴重失眠而產生精神錯亂。陳布雷一旦患上精神病，神經更加錯亂，那就壞了他蔣某人的大事了。蔣介石想著想著，嘴上不住的自言自語道：「不妥、不妥」；心想處置了兩個小共產黨（指陳璉夫婦），怕要賠上一個大國民黨（指陳布雷），這是我自斷肱股的下策。

想到這裡，蔣介石通知秘書約陳布雷到官邸有要事相商。蔣介石一見到陳布雷，趕忙說：「布雷先生，令愛與令婿的事，我已決定，都要來南京，由你加以管教約束。現在別說還沒查出兩人共產黨的證據，就是查出來，由你來管教約束，他們的共產黨也就起不了作用了。都是兩個年輕人，又是先生的令愛和令婿，我也聽說了，先生最愛憐的是這個女兒，其中還有一段故事。先生對此女能憐而愛之，我又怎能壞先生之愛而置其於絕地。先生勿作其他考慮，吾意已決，把令愛

和令婿叫到南京，這事我派鄭介民和傅作義辦理，先生不用管，到時候你們父女相見和你們翁婿相見，大家對此事一字不提。」

蔣委員長法外施恩

一九四七年底，傅作義命令國防部二廳

（由原軍統局改組而成）在北平站派人把陳璉和袁永熙押上軍用飛機，並對二人說：「你們的案情大，在北平不好處理，要送到南京去處理。」飛機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降落后

，立即由押送人陪同送到南京羊皮巷特刑庭看守所。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知道陳布雷的女兒和女婿已押到南京後，就專門向蔣介石請示如何處置，蔣介石對鄭介民笑笑說：

「你想，我們能把布雷先生的女兒像處置別的共產黨的辦法來處置他們二人嗎？那樣做，我們就錯了，就把布雷先生的命也搭進去了，就是拆去我的肱股。對布雷先生的女兒和女婿不能殺，關了幾天以後，就派人用車子把兩人送到布雷先生家中，就對他們說，他們二人是由陳布雷保釋的。」

一九四八年一月，鄭介民正式通知特刑庭看守所放人，要看守所的負責人對陳璉和袁永熙說：「你們二人是陳布雷具名保釋的，並交由陳先生管束。」實際上陳布雷對陳璉和袁永熙由北平押至南京一點都不知道，更談不上解釋這回事了。看守所負責人對陳璉和袁永熙宣布由陳布雷保釋一人後，卻改口說：「袁先生和袁太太，請你們上汽車吧

，我們就不奉陪了。」兩人上了汽車，司機問也沒問，開起車子就走，一直開到湖南路陳布雷公館門前停了下來，對陳璉和袁永熙說：「先生和太太，現在到家了，請下車吧，上級交給我的任務也完成了。先生，沒有東西忘在車子上吧！再見。」

司機車子一走，陳璉和袁永熙相視而笑，同時都說：「怎麼？我們被釋放了，自由禁大吃一驚，說：「你爸爸也沒有提到說你們出獄到南京的事，這一定是委員長的安排。自從你們在北平入獄後，你爸爸的失眠症更厲害了，安眠藥加了一倍的分量，睡眠仍然很差。中午你爸爸快下班回來了，這回他的失眠症總可以好些了吧！」

中午，陳布雷進屋一眼看到陳璉和袁永熙坐在室內，又像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陳璉在昆明失蹤後回到重慶家裏那樣，一直是不住的說：「好，好；」又加上一句：「永熙也來了，好，在家裏住些時候。」王允默對著陳布雷，又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這回你的失眠症總可以好些了吧！」陳布雷卻輕輕說了一句：「爲了家事，失眠可以好些；爲了國事，怕失眠的更要厲害了。」

陳璉從南京特刑庭看守所出來後，被送到浙江慈溪老家；不久，陳璉就生了第一個孩子。當年夏天，陳璉又回到南京，袁永熙也由上海回到南京。陳璉拜望了中央大學歷史系繆鳳林教授；繆先生知道陳璉是陳布雷

中的女兒，對陳璉在中大當助教時的印象也很好，知道她今天沒有工作，答應向國立編譯館館長陳可忠介紹，於是陳璉改名為陳碧如進入該館工作，分編世界歷史小叢書；袁永熙也在南京另一個單位找到工作。

由剿共派變撫共派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後，九月卅日，侍從室一、二、三處奉命撤銷。當年十二月，侍從室一處改組為國民政府參軍處的軍務局，由俞濟時任局長；侍從室二處改組為國民政府文官處政務局，由陳方任局長；三處人員遣散。蔣介石原想要陳布雷擔任國民政府文官長，而陳布雷在三次擬定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朱德爲受降長官，三次的名單都被蔣介石把朱德劃掉，背後發牢騷說：「蔣先生的氣量太小了」，實際上內心覺得中共在艱難困苦抗了八年的戰，現在在受降中給它完全排除在外，自己覺得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同時也預感到蔣介石要在八年苦戰後又要對中共動干戈了。陳布雷從自己女兒陳璉身上看到，參加共產黨的都是熱血沸騰，有思想有主張，有作爲，不怕苦，不爲私的好青年；而參加國民黨的，卻是一些唯唯諾諾，遇事無所作爲，貪生怕死，一心爲私的青年。陳布雷心想：中共既在全國上上下下這樣得人心；而國民黨這樣腐敗無能，這樣不得人心；共產黨全黨這樣團結一致，國民黨這樣在黨內外

分裂。兩黨相比之下，國民黨居於掌權的地位，共產黨雖處於在野的地位，但孰優孰劣，國人已有定論；要是再打內戰，到底將來鹿死誰手，殊難逆料。八年前的陳布雷是一位堅定的「剿共派」，而經過八年抗戰之後，特別在自己女兒活生生的現實面前，他已由「剿共派」變爲「撫共派」了。他是忠實的站在國民黨立場，但不主張用內戰手段來解決國共兩黨間的矛盾，而主張用和平的政治手段來解決問題。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國民黨爲了加強對中共的宣傳戰，把中宣部正副部長、行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張道藩）及中央組織部長組成宣傳小組，蔣介石指定陳布雷爲召集人；一九四六年五月又加入國防部政工局長（鄭文儀）。蔣介石滿以爲陳布雷還像抗戰前對中共那樣的鬥志，殊不知在八年抗戰中陳布雷經過了國事和家事的變化，已使他鋒利的筆鋒成了無力的銀樣臘槍頭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開完後，不知是那個提出要給蔣介石修家譜，這當然是陳布雷的工作了。於是陳布雷約集胡適、柳詒徵等一大串國內的名流碩儒爲蔣介石家譜的修纂人。此譜於一九四八年修成，線裝四冊，修纂人由陳布雷領銜，國內存本甚少。筆者有幸於一九五二年在南京原江蘇國學圖書館得見此譜，今存南京圖書館。

蔣介石要陳布雷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爲蔣介石）文官長，陳布雷厭倦於國民黨內的政治生活，就以身體狀況爲由向蔣介石堅辭不就。蔣介石不得已，只好繼續任吳鼎昌爲文官長，而以陳布雷爲國民政府委員，並任

京之時，蔣介石要陳布雷寫篇在還都典禮上的講演稿，題目是《戰後建國之要義》。陳布雷不知吸了多少廳三炮台香煙，寫了址，扯了再寫，最後雖勉強把文章湊出來，連自己也不滿意，暗暗嘆道：「前人說江郎才盡的，我現在才體會到這話的意義。」八月，抗戰勝利一周年時，蔣介石要陳布雷寫一篇《告全國民衆書》。按說在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出師之時，陳布雷激於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義憤，曾寫三篇擲地有聲的《告黃埔同學書》，於今經過八年的血戰贏得抗戰勝利周年之際，應當有篇名文傳世。陳布雷也知道這篇文章的重要，但寫來寫去，卻寫成了一篇中心內容爲建國必先行憲的毫無生氣的御用文章。文章寫了之後，陳布雷默坐了許久，嘆道：「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一個人的腦袋不能聽自己使喚！」

經濟崩潰內心矛盾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之時，蔣介石要陳布雷寫篇在還都典禮上的講演稿，題目是《戰後建國之要義》。陳布雷不知吸了多少廳三炮台香煙，寫了址，扯了再寫，最後雖勉強把文章湊出來，連自己也不滿意，暗暗嘆道：「前人說江郎才盡的，我現在才體會到這話的意義。」八月，抗戰勝利一周年時，蔣介石要陳布雷寫一篇《告全國民衆書》。按說在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出師之時，陳布雷激於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義憤，曾寫三篇擲地有聲的《告黃埔同學書》，於今經過八年的血戰贏得抗戰勝利周年之際，應當有篇名文傳世。陳布雷也知道這篇文章的重要，但寫來寫去，卻寫成了一篇中心內容爲建國必先行憲的毫無生氣的御用文章。文章寫了之後，陳布雷默坐了許久，嘆道：「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一個人的腦袋不能聽自己使喚！」

進入一九四七年五月抗戰勝利後的反內戰民主運動高潮到來，陳璉已是共產黨，而陳布雷最小的兒子陳礮也參加反內戰的行列。

再一次增加陳布雷內心深處的矛盾。陳布雷這時常與張治中、邵力子兩人來往，偶爾也露出一點內心的痛苦。

一九四八年春，陳布雷奉命主持準備的第一屆國民大會的各項文件。三月廿九日，

國民黨單方面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大會開幕，

四月十九日，蔣介石以二四三〇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廿九日，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

五月廿日，蔣介石和李宗仁在南京國府路國民大會堂（今長江路人民大會堂）就任中華民國正副總統。此時，國民黨統治區物價已一夕數漲，經濟崩潰即在眼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國民黨當局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同時發行金圓券，停止舊法幣流通；頒布《金元券發行辦法》及《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規定金元券發行額為二十億元，金元券一元兌換法幣三〇〇萬元；黃金每市兩兌金元券二〇〇元，白銀每市兩兌金元券三元，銀幣每元兌金元券二元，美元每元兌金元券四元；限期收兌人民所有的黃金、白銀、銀幣和外匯，並禁止其在國內流通。同時，政府宣布實行限價政策。

陳布雷參加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前後的各種會議，當然要以身作則，把自己家中的私人的金銀手飾、器皿及銀元一律兌換成金元券，宣傳小組的一〇〇億法幣的公款也兌換成金元券。十月，國民政府共兌黃金值二億美元，而宋子文和孔祥熙等達官貴人則絲毫無動於衷。到十月下旬，搶購風已遍及

全國各大小城市；十一月九日，南京、上海發生搶米風潮；十一月十日，國民政府宣布取消限價，金元券此時已貶值十倍。國民黨政權的經濟崩潰已立現於眼前。

淒風苦雨政治悲劇

此時的遼瀋戰役已結束，國民黨損失四個兵團、十一個軍，約五十萬人。而淮海戰役已開始，黃伯韜兵團在碾庄被圍，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崩潰也立現於眼前。在南京秘密編輯的《大學評論》（在上海秘密印刷出版）上，這時發表了中央大學和金陵大學四十七教授致蔣介石和毛澤東二人的公開信，呼籲和平；同時刊登了「大學評論特約記者」

撰寫的「鍾山風雨多，金陵王氣盡」的軍事通訊，指出國民黨的經濟崩潰、軍事崩潰、政治崩潰即在眼前，南京城內一片淒涼景象。正是在這「秋風秋雨愁煞人」之時，在國民黨政權全面崩潰在即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淒風苦雨的江南名城南京，陳布雷服了大量安眠藥自殺於湖南路寓所。

陳布雷看到國民黨政權的崩潰在即，在萬般失望中在「國事」和「家事」的嚴重政治衝突中自殺了。陳布雷看到自己忠誠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黨在貪污腐敗中必然歸於失敗，又看到自己堅決反對的共產黨在艱苦奮鬥中很快就要勝利，為殉自己的信仰和主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陳布雷也看到自己所堅決反對的共產黨，卻又正是自己子女所堅

決追求的共產黨，在信念的懷疑與動搖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陳布雷的自殺是中國社會政治大動盪中的一場政治悲劇。（未完待續）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 調換。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雋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